

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

——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

顏 健 富*

摘 要

晚清的空間概念經歷重大衝擊，地理想像的轉變影響到文學表現，本文以《癡人說夢記》為主要的分析對象，探討小說如何在「地理大發現」的衝擊下產生空間的變革。首先，本文從敘事中的父子的空間想像，論析傳統「仙人島」如何轉變到具有現代性視野的「鎮仙城」以及其意義；接著，論證新地理觀如何衝擊到小說的敘事，晚清後起的地理與政治概念如「五大洲說」、「國家」等進入了小說版圖，人物在逃亡時以天下為家，可是接著又很弔詭地發現天下無家，進而產生虛化的空間——烏托邦；本文進一步分析此虛化空間所展現的視野，科技與民主介入了此空間，成為往後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最後，本文指出當烏托邦方案建構出來時，卻也一體兩面地步向反烏托邦的方向，自我消解了原初的理想性，出現創作動機與書寫結果的斷裂。

關鍵詞：旅生 烏托邦 仙鄉 晚清 地理

94.7.25 收稿，94.11.29 通過刊登。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一、前言：旅生的「癡人說夢記」

相比起吳趼人、李伯元、劉鶚、曾樸等晚清大家，旅生在當今的晚清文學接受史上，似乎不佔前線位置，關於他個人的資料記載也不多見。不過，我以為《癡人說夢記》在晚清小說中實是一篇關鍵性的小說，理應獲得更多注意，如阿英所言：「全面描寫晚清社會的小說，其值得著錄的，除《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老殘遊記》四書而外，尚有蘆園《負曝閒談》、旅生《癡人說夢記》、八寶王郎《冷眼觀》、吳趼人《上海遊藝錄》。這幾部小說，一樣是很有力的在暴露當時政治黑暗。」¹又如當代研究晚清小說史的學者歐陽建所言：「晚清的最後十年，曾經被描寫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裏，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萌發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理想憧憬。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和富強，是晚清新小說最普遍突出的主題。其中，蔡元培的《新年夢》、旅生的《癡人說夢記》和姬文的《市聲》，代表了此類作品的三種不同類型，……是小說史上值得重視的全新現象。」²

阿英與歐陽建都試圖凸顯《癡人說夢記》的位置，前者將此小說的價值歸因於暴露政治黑暗，後者則是從相對面指向它嚮往未來光明。兩人對於此小說極為不同的解讀，恰好反映出暴露政治黑暗的譴責小說與想像未來的理想小說風靡於晚清文壇。可是，值得我們再思考的是：《癡人說夢記》何以在比比皆是的「暴露黑暗」與「想像光明」的書寫中顯得格外重要？這方面的論述仍有待展開。

《癡人說夢記》連載於《繡像小說》第十九期至五十四期（1904），敘事一開始寫父輩人物賈守拙夢見「仙人島」，夢境乃是挪用秦始皇派人尋找仙人島的傳說，賈守拙將夢境告知孩子賈希仙。若干年後，賈希仙與同學甯孫謀、魏淡然不願接受教會教育，逃往上海，因故失散，各奔前程。賈希仙被認作新黨成員，遭官府捕押過程中逃脫，開始流亡的生活。在現實世界難於居一席之地，賈希仙率徒尋找傳說中的仙人島，幾經波折，終覓得該島。經由眾人拓荒開發，施行文化、教育、政治、科技等改造方案，「仙人島」一轉而為具有現代性視野的「鎮仙城」。

1 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34。

2 歐陽建，《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頁225。

《癡人說夢記》投射出的空間變革顯然並非止於「癡人說夢」而已，其空間方案帶有繁複意義，反映時代的空間視野。敘事透過父子兩代的空間想像，完整反映晚清空間概念的轉折——從傳統的「仙人島」過渡到具有現代意義的「鎮仙城」。在「故事新編」的架構上，³此「仙人島」充滿錯位。作者挪用仙鄉符碼，改寫敘事，以古代版的仙人島傳說，完成現代版的冒險航程。由此，仙鄉的「故」事在作者「新」編的過程中具有諸多張力，在新舊文本的差異、重疊、磨合過程中，原本是尋找「仙人島」的故事卻變調成「鎮仙城」的建構。傳統與現代、迷信與科技等議題在此體系論辯，創造出嶄新的意義空間。

除此以外，敘事中的「仙人島」與「鎮仙城」的空間圖像尚隱藏著「仙鄉」與「烏托邦」的思辯。仙鄉與烏托邦看似都是理想空間的系統，可是卻存有極大落差，本文將於後文論證。仙鄉是中國原有的文學傳統，「烏托邦」對於晚清而言也非懸空的理論，一八九四年嚴復譯《天演論》時便譯介了烏托邦：「烏托邦者，猶言無是國也，僅為設想所存而已。」⁴在小說創作中，〈烏托邦遊記〉主人翁偶聞英國有烏托邦小說，非常嚮往，夢中得人指點，於是到「何有鄉」搭船往遊烏托邦。由此可見，烏托邦已進入時人的視野。本文將從評論層面的「仙鄉」與「烏托邦」理論，分析敘事中的「仙人島」與「鎮仙城」，以拓深論點。

為呈現晚清的空間語境，本文首先從此時代的「地理大發現」切入，鋪陳出新地理視野與晚清知識處境的關係。過去小說研究者在研究晚清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時似乎鮮少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切入，較難貼切把握到這些小說的空間意涵；第二，《癡人說夢記》從具有傳統仙鄉符碼的「故事」（仙人島）新編出具有現代意義的「鎮仙城」，淋漓盡致展現晚清空間概念的轉變，本文將緊貼著文本賈氏父子的空間想像，論述「仙人島」演變為「鎮仙城」的空間意義，並且從尋找仙鄉／鎮仙城的人物身分、動機與交通工具角度切入，論證新舊視域的差別；第三，晚清新地理觀的衝擊，影響到小說的敘事，人物在尋找理想空間的過程中，受到全球意識的影響，從中國內部走向世界，流蕩天下，本文將論證此空間遊蕩對於小說敘事造成的衝擊；第四，本文將具體分析賈希仙於島上締造的「烏托邦」方案的內涵，民主制度與科技穿梭於此空間，形塑出時代的特殊視野；最後，本文將從小說表層的烏托邦視野進一步挖掘其更深

3 「故事新編」取自魯迅，按照魯迅意涵：「故事新編」乃是取材於神話、傳說、寓言、歷史，「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魯迅便是以傳統材料的「一點因由」，寫成《故事新編》集。見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臺北：谷風，1989），卷1，頁337。

4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71），頁30。

層的圖像：在追求烏托邦時卻也意外衍生出一些反烏托邦的質素，形成曖昧的空間觀。

本文以《癡人說夢記》為主要的分析對象，不過在論證過程中，會擴大涉及到其他同時代的小說，以更完整的面貌反映晚清的時代視野。

二、「地理大發現」與晚清知識界

晚清的「空間」概念在劇烈的政經演變中受到重大衝擊，林則徐《四州志》、魏源《海國圖志》、姚瑩《康輶紀行》、梁廷柅《海國四說》、徐繼畲《瀛環志略》等書相繼介紹西方各國地理景觀，打開中國人的眼界，改變中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在一連串的軍事挫敗中，傳統萬國衣冠拜冕琉、享盡天朝榮光的空間想像破滅，迫使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現實中的新世界秩序，從「我的，所以必是真的」（Mine and True）漸轉向「西方的，所以必是真的」（West and True）。⁵在此時代的轉型中，傳統中國地理觀受到嚴峻挑戰。

明末清初至晚清士大夫對於西學地理知識接受態度的轉變，在在訴說著一系列空間知識、秩序正劇烈重構。以「中國中心論」而言，當利馬竇展示萬國輿圖，揭發中國不處於地圖中央及地圓觀念時，被認為是妖言惑眾。可是到道咸時期，魏源《海國圖志》已經揭開「中國」的迷思，「中國」不代表天下中央，「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⁶徐繼畲《瀛環志略》則是拋棄了棋局的傳統空間觀念，改以「地圓」說：「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數分經緯線，縱橫畫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國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⁷

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創立的「地球繞日說」恰好提供了晚清知識分子論述地圓、地動等論述的依據。此學說原是西方天文界的大革命，挑戰與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地理權力知識——中國以本身土地為「萬邦為首」的想像，也是一種掌控地方與權力的「定位空間」（space of emplacement），由他人來朝拜。魏源《海國圖志》便指出：「昔人云：地球懸於渾天之中，靜而不動，日月各星，晝夜循環於其外。迨前明嘉靖二十年間，有伯罷尼亞國人，哥伯尼

⁵ 賴伐生（J. R. Levenson），*History and Value: The Tension of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此引自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文化，1985），頁193。

⁶ 魏源，《海國圖志》（湖南：岳麓書社，1998），卷74，頁1850。

⁷ 徐繼畲，《瀛環志略》（臺北：華文書局，1968），卷1，頁39。

各者，深悉天文地理，言地球與各政相類，日則居中，地與各政皆循環於日球外，川流不息，週而復始，並非如昔人所云靜而不動，日月各星，循環於其外者也。以後各精習天文諸人，多方推算，屢屢考驗，方知地球之理，哥白尼各所言者不謬矣。」⁸如此的言論當然會激怒保守分子，蓋因星球運轉流動的觀念除了在地理學上產生意義外，尚蘊含著權力的施加，「中國」不動的定位性被迫延伸(extend)、流動(mobile)，打破了萬邦為首的穩固位置，成為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延伸空間」(space of extension)。⁹

「五大洲說」的傳入，進一步衝擊到中國自我為中心的地理想像，徐繼畲便說：「大地之土，環北冰海而生，披離下垂如肺葉，凸凹參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為四土：曰亞細亞（即亞洲），曰歐羅巴（即歐洲），曰阿非利加（即非洲），此三土相連，在地球之東半；別一土曰亞墨利加（即美洲），在地球之西半……近又有將南洋群島名為阿塞亞尼亞洲（即澳大利亞）。」¹⁰亞洲、歐洲、非洲、美洲與澳洲地理位置明確被列出，宣告了中國不在中央的事實。

同光年間，隨著清政府派人出國遊歷、考察，世界地理的研究如火如荼展開。張德彝《航海傳奇》、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黎庶昌《西洋雜誌》、王韜《漫遊隨錄》等，親身的遊歷、考察與見證，掀開了晚清「開眼看世界」的格局。¹¹他們在日記、紀錄、雜記等書寫中，將各種地理新知、國內外形勢與海外遊歷造成的心理衝擊，一一展現。李圭是中國工商界的代表，一八七六年到美國費城參加世界博覽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一改原本對於地圓說的質疑，「地形如球，環日而行，日不動而地動……圭初亦頗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環球而遊焉，乃信。」¹²當然，李圭也記載了博覽會的先進機器、西方的工商製造等，為中

8 同注6，卷96，頁2189。

9 傅柯曾以地理學觀點說明空間權力的分佈。在傳統的宇宙論中，存在著固定的神聖地點與凡俗地點：超天國地域相對於天國，天國又相對於現世地域，形成完整的階級對立，構成所謂的「定位空間」，權力也固定地由聖向俗。可是，「地球繞日說」的發現，使得穩定的地點瓦解了，過去被尊崇的不動地點原來只是移動的一個點，成為「延伸的空間」。見 Michel Foucault, "Text/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1986), 22-27.

10 同注7，頁41。

11 據王爾敏的大略統計，「自一八六六年至一九〇〇年，撰著外國記事之人物有六十一位，而撰著記錄達一百五十一種。」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1982），頁24。

12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湖南：岳麓書社，1985），頁312。

國人打開了另一個文明世界的圖景。屬於洋務派的薛福成於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年親歷歐西，在出使日記裏記載的「地圓說」呼應了其前輩魏源、徐繼畲等人的說法：「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此中國聖人之舊說也。今自西人入中國，而人始知地球之圓。凡乘輪舟浮海，不滿七十日即可繞地球一周，其形之圓也，不待言矣。」¹³其出使日記進一步記錄了西方的文明：由上下議院組成的議院制度、學科分明的學堂、連華陀也無以勝之的醫術、快速飛馳的蒸氣火車等。

當然，這種對於西方地理的接受只是一個整體趨勢。以微觀而言，當中涉及到立場派別，被劃分到守舊派的知識分子依然試圖捍衛傳統的空間觀。即或是到維新運動時期，新地理知識已透過專書著作、出使遊記、課本編譯等傳開，湖南葉德輝仍寫信給皮嘉祐的父親皮錫瑞，反駁皮嘉祐的「中國非中央」論：「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為中，但合東南西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是東西矣。亞洲居地球之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為黃種，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為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¹⁴葉德輝力證中國的中央論，試圖延續民族的尊嚴與地位，不過這類抵抗式的呼聲隨著時代的演進漸為式微，天朝大國的千秋大夢似乎已被敲碎。

新空間觀使得知識分子重新發現自我的定位，鄒振環在《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便提到晚清「地理大發現」的文化意義：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轉向「全球意識」。¹⁵確實，此全球意識風靡晚清各界，衝擊的效應奇大，成為晚清新派知識分子的群體共識，「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士之曠識」，反對

13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湖南：岳麓書社，1985），頁499。

14 葉德輝，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二（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頁649-650。皮嘉祐原於《湘報》27號發表醒世歌：「若把地圖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中央誰四旁。西洋英俄德法美，歐洲各國爭雄起。縱然種族有不同，何必罵他是鬼子。」

15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2000），頁145。作者指出晚清的「地理大發現」為中國人向域外尋求新知識建立了「地理台階」，正是走在這個「地理台階」之上，中國人一步一步推進了對「西學」的理解，從兵船製造的技術科學，到聲光化電的自然科学理論；從交涉公法的社會規範，到哲學文學的心理認知的層面，十九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正是這樣逐漸理解了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觀念。中國人開始拋棄傳統的天下觀念而建立起一種全球意識，承認世界有多元文化的存在。

「株守一隅，自畫封域，而不知牆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¹⁶

在思想界方面，新地理觀改變了思想家的思維空間，以清末著名思想家鄭觀應為例，據樂正的統計，《救時揭要》和《易言》涉及國外地名多達十五個，《易言》出現六十個，包含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德國等。¹⁷以文學界而言，批評家無論是在論證小說地位或是實際的小說書寫時，大量以「橫的移植」的方式旁徵博引，將歐美經驗引入視野，如梁啟超「小說界革命」除達到一般論者所謂的提高小說地位以外，尚隱藏「全球意識」的論述，¹⁸反映西方的地理標誌已經進入知識分子的視野。這些新地理觀也進入小說的敘事，如曾樸《孽海花》女主角雯青讀過《瀛環志略》、《海國見聞錄》、《海國圖志》等書，出使海外各國。思綺齋《中國新女豪》英娘幾乎遊遍歐美各國，努力促進婦女權益。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黃毅伯與李去病二人在歐洲留學，遊歷幾個國家。《萬國演義》分析宇宙進化及五大洲各國詳情等。此類「旁咨風俗，廣覽地球」的書寫在晚清小說中多不可數，透過敘事開啓了晚清的全球意識。

本文鋪陳出「地理大發現」與晚清知識界的關係，乃是欲將此地理大發現置入思考脈絡，評估晚清小說如何受到此新地理觀的影響？到底中國中心論的破滅、五大洲與地圓說的發現、全球性的地理意識等如何衝擊到小說敘事？這些地理論述所帶來的西方民主制度、科技想像又如何出現在小說？本文將在下一節處理仙人島與鎮仙城的關係後，於第四與第五節相繼展開此方面的論述。

三、「父子」關係：從「仙人島」轉向「鎮仙城」

如前所述，《癡人說夢記》透過父子兩代的空間想像，呈現「仙人島」轉往「鎮仙城」的軌跡。對於晚清而言，「父子」關係有多層意涵，從倫理、政治、文化等層面都有特定對照，¹⁹賈氏「父子」的空間想像實微言大義，彰顯

¹⁶ 同注6，卷76，頁1889。

¹⁷ 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179-180。

¹⁸ 梁啟超在論述小說時，以歐美經驗作為說明，顯示了他的「全球意識」：「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最高焉。」見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60），冊1，頁122-123。

¹⁹ 筆者曾分析晚清至五四的「父子」框架中的老大帝國／少年中國、長者本位／幼者

了更多層面的意義。本節將在「父子」的框架上，從幾個視角來觀察新舊視域的不同，進而再分析此「父子」關係隱含的多面性。

小說一開始便以賈父之夢為開端，返回到秦始皇出榜招賢之時，尋找仙人島的年代：

我做了一夢，夢到一箇所在，一望是水連天，天連水，腳下踏了一張樹葉，飄飄蕩蕩，隨著風渡了過去，看見一座高山，便停下了。那山腳下去有一片沙灘，隨腳走了幾步，前面一片土地，人家不少，那些人的穿著，合（和）我們大家不一樣，一色短衣裳皮靴子，頭上還帶頂有邊的草帽。

海裏有箇仙人島，在雲霧中間，遠遠望著，有些金銀宮殿，直上雲霄，有人費了無數錢財，要尋此島。

接著，作者援引史料與傳說，賈父的夢境出現尋找仙人島的徐道士，途中出現霧、高山、海等，隔開了世俗空間與神聖空間，猶如一種淨化的「通過儀式」，宣告人物從俗入聖，與傳統的桃花源書寫形成一對應關係，²⁰而仙人島的神秘與遙遠似乎已成文化心理再現的模式。

旅生在秦始皇派方士尋找仙山的架構上，衍生敘事，隱然可見仙鄉的傳承。尋找仙鄉的書寫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不乏傳承與流變，小川環樹便曾根據仙鄉故事經常出現的八大母題，分析「仙鄉」符碼的塑造。²¹旅生以「仙人島」命

本位的關係，見顏健富，〈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漢學研究》20卷2期（2002），頁302-307。顏健富，〈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23卷1期（2005），頁346。

- 20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便將漁人探桃花源的行程置入 Joseph Campbell 的「通過儀式」（rite de passage）聯繫起來，見《中外文學》15卷3期（1986），頁87；鄭文惠，〈新形式典範的重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新探，提及桃花林是穿洞儀式前的中介空間，是常／非常、俗／聖空間的中介站，船、水源、桃花林皆可視為儀式中「生命形式轉化」的主要媒介，見衣若芬、劉宛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頁283；楊玉成，〈世紀末的省思：〈桃花源記〉并詩〉的文化和社會，透過儀式的觀點，指出桃花林可看作儀式中介的特殊時空，一個通道和聖地，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卷4期（1998），頁98。

- 21 小川環樹著，張桐生譯，〈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指出：一是山中或者海上，二是穿過洞穴，三是得到仙藥和食物，四是與美女相遇而結為夫婦，五是得到仙人傳授道術與贈物，六是懷鄉、勸歸，七是強調仙鄉裏時間經過的速度，八是再歸與不能回歸，見《幼獅月刊》40卷5期（1974），頁34-35。

名，點出秦始皇的傳說，其呼應仙鄉傳說之意甚明。不過，若是更深入探討此呼應與模擬，卻會發現其與傳統仙鄉的斷裂，比起其聯繫更為明顯。在仙鄉的線索上，《癡人說夢記》出現諸多錯位與變調，其價值底蘊實已改弦易轍。

對於賈守拙此一「父」輩而言，仙人島確實呼應著秦始皇時代的傳說。夢中的徐道士毛遂自薦，帶著三千箇童男童女，浩浩蕩蕩前往仙人島，一去十年，杳無音信。原來徐道士已成仙人島島長，種植仙草，服後長生不老。隨行的童男童女皆成神仙部民，「一樣耕田種地，不消納得租糧，亦不見有人犯法喫官司，拉進衙門受差人的欺負。」在故事新編的框架上，作者替徐福「後設」餘生，其訴求（如長壽、田園、免苛稅與免冤法等議題）仍偏向傳統仙鄉的旨趣。

「子」輩人物賈希仙率領志同道合的新生代，尋找父輩人物夢中的仙人島，終於在海外尋得，並且締造一個有別於現實的理想社會。這看似「子繼父業」的傳統倫理，其實反映了空間想像的大轉變。對於兒子而言，仙人島已經逸出長壽、免苛稅等傳統議題，創造出以科技與民主為掛帥的理想社會。相對於無為的仙鄉，此經由改造的鎮仙城呈現出一為而又為的空間視野。

無論是從人物的實質歷程或文學史的隱喻，賈希仙尋找「仙人島」並且進一步轉化成「鎮仙城」的意圖與過程，正好可被視為一個從「仙鄉」航向「烏托邦」的旅程。當然，「烏托邦」理論的界定充滿人為性，目的論強調實現烏托邦演變時間的過程，價值論以價值高下的觀點描述最終完美之境的目標。²²大致而言，「烏托邦」一詞創自摩爾（Thomas More）之專書《烏托邦》，原稱「好地方」（*euthopia*）或「烏有鄉」（*outopia*），描繪廢除私有財產後的理想社會，實行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制度。²³張惠娟對於「樂園」與「烏托邦」的定義正可作為區分賈氏父子空間想像的借鑑：「樂園」是屬於靜態的，嚮往簡樸的生活，是一個「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反之，烏托邦則是動態，「一個理想與現實交織，美好與醜惡交融所構造的一個活潑的園地。」²⁴用 Gorman Beauchamp 的烏托邦理論來區分，我們可指稱《癡人說夢記》賈父夢中的仙人島是「比文明制度不足」的空間（*civilization-only-less-so*），缺乏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的刻畫，更偏向「架構的自足而封閉的體系」。賈希

22 Eric Voegelin,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Chicago: Gateway Edition, 1968), 88-89.

23 Thomas More, *Utopia*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47)，此書原發表於一五一六年。Utopia 從希臘文與拉丁文語系有不同解釋，希臘文為 *Ou-topos*，*ou* 是「無」的意思，「*topos*」則為場所，是世上所無的場所；從拉丁文而言，是 *Eu-thopia*，*eu* 是「美好」之意，表示美好的地方。

24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15卷3期（1986），頁80-81。

仙創造的鎮仙城則是「比文明制度更甚」(civilization-only-more-so)的空間，富有入世精神。²⁵我們可從幾個線索——尋找者的身分、動機與交通裝備——探討新舊視域的異同。

(一) 尋找者的身分

史傳記載的秦始皇發眾徒尋找仙人島，乃是為尋取長生不老之藥。「尋找者」是以具有方士身分的徐福為首，方士具有神秘的超自然能力，可到一般人無法前往的仙山，其職能與古代的神巫類似，溝通天地，在政治與巫術相結合的王朝中掌管鬼神、祭祀、農業、音樂、醫藥等職位，一直到宗教的巫權勢力衰減，方士才成為後來煉丹藥的道士。²⁶發展至魏晉唐代，進入仙鄉者不再局限於方士，允許樵夫、漁夫等凡人進入仙洞，反映了道教的普遍化，凡人也可一睹仙鄉之奧秘，而仙鄉書寫也隨著時代演進日趨世俗化。²⁷

到了晚清，《癡人說夢記》的入仙鄉者更是饒富時代意義，從傳統方士、樵夫、漁夫變成「感時憂國」的愛國者。如果說尋求長生不老之藥的方士透露對於時間的焦慮，樵夫、漁夫反映道教的普遍化，那麼愛國者則顯示救亡圖存的期許與焦慮。這種對於角色的篩選，正好切中晚清人的幽幽心事，如何在頹壞時局重新振作，成為一代作家關注的焦點。蕭然鬱生〈烏托邦遊記〉主人翁進入烏托邦前受阻：

你是老大帝國的人民，不曉得盡心竭力，振興祖國，只知道遊蕩。

你現在還想到烏托邦去麼，恐怕烏托邦裏，不配你這種人遊歷的。²⁸

由上引文可見，進入烏托邦者有條件的限制，「盡心竭力，振興祖國」者方可進入，「老大帝國的人民」則無法入關。

若是我們將「進入仙鄉」的敘事擴大為「進入理想社會」，可見到晚清小說中的「通關者」必帶有沈重的使命感，在化外之境模擬、想像、虛構一可撇開當下苦難的理想社會。由此，「愛國」成為人物尋找理想社會的門檻，如吳

25 Gorman Beauchamp,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Midwest Quarterly*, 16 (1975), 161.

26 王孝廉曾對闖入仙鄉的「方士」的演變作出一勾勒，此參考王孝廉，〈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文史學報》12期（1982），頁50。

27 李豐楙在比較六朝隋唐的遊仙詩便特別關注唐代遊仙文學受到時代體制的影響而世俗化，融入了娼妓風尚與科舉制度下的士不遇情懷等，見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1996），頁16-23。當然到了往後的話本小說，仙鄉書寫更進一步世俗化。

28 蕭然鬱生，〈烏托邦遊記〉，《月月小說》1期（1906），頁6。

跂人《新石頭記》讓修道幾世的寶玉返回凡塵，漫遊上海、天津、武昌後，變成全方位的感時憂國者，終於進入「自由村」。春飆《未來世界》總教習陳國柱立志教育濡染人民大眾，闖入「未來世界」，建構出一完善社會。杞憂子〈苦學生〉在美國勤學苦讀的黃孫因受到諸多歧視，憤而離校，意外走入清幽雅靜的世外桃源，完成學業，返回湖南從事國民教育。這些闖入理想社會的主人翁，分享「堅毅不撓，愛國如家」的共同形象，也宣告了過去在仙鄉位居要津的方士、漁夫、隱士等在晚清敘事中退位。

在此「愛國」基調上，我們可進一步指出《癡人說夢記》的政治影射。甯孫謀、魏淡然二人在國內參加會試時投上維新條陳予皇帝，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的寫照。黎浪仙策劃起義，追求革命，是孫中山的化身。可是在作者的筆調下，維新圖強之路不通，革命亦不成功，唯有航向海外的賈希仙可通向成功之道，也反映了晚清「流蕩全球」的思維。

（二）尋找動機

同樣是尋找仙人島，可是動機卻有所改變。《癡人說夢記》人物的關注點已非個人壽命之有限與無限的辯證，而是透過地理的遊蕩，將一己之小我投射向國家之大我。傳統的仙鄉嚮往簡樸好靜的生活，創造「比文明制度不足」的蹊徑，呈現與世隔絕的空間。《癡人說夢記》的仙人島恰好相反，人物帶著強烈的政治意圖，甚至以「殖民」為尋找動機，「我們要去仙人島開殖民地，若承諸君不棄，結伴同去，如何」，「海外殖民」成為賈希仙振衰起敝的良方。西方的「海外殖民」進入了小說的視野，²⁹被角色挪用為解決自身困境的方法。

不經由世俗污染的仙人島再也非人間美好之境，仙島之所以成為仙島的關鍵在於「文明」，「我本意要整頓這島，合（和）美洲一樣興旺」。賈希仙等人壯志凌雲，開礦採煤，大肆發展，希望將封閉性的仙鄉開放，與外交流：

我們島中貨物充足，可以出去通商了，我想通商的利有數端，一則以有易無，二則可以知道各國的新法，三則可以招致些客民來，免得島中人數寥寥，不敷作工之用。

「無所為」與「有所為」正好可作為仙鄉與烏托邦的區分，賈希仙的空間方案規劃了一系列積極入世的發展計畫，如 Lewis Mumford 所謂的「重建性烏托邦」（utopia of reconstruction），指人類憑藉一己之力創造理想世界，包括改良政治、社會制度等。傳統仙鄉則是偏向於「解脫性烏托邦」（utopia of escape），

29 對於西人海外殖民的紀錄大量出現於晚清西方地理學的書籍，如徐繼畲，《瀛環志略》記錄：「葡萄牙航海至印度西南界之孟買，開鑿海港，建立城邑」，同注7，頁199。

是神和大自然所賜予的理想世界，邦內人民無須勞動便可享有美滿生活。³⁰傳統的尋找者進入仙鄉後往往受到擺布或震撼，乃是固著於「話語接聽者」的位置。可是，賈希仙闖入化外之境，一躍而為「話語發話者」，以新知識改建仙鄉符碼，成為動態的鎮仙城。

（三）交通裝備

我們還可從一個有趣的視角論證傳統與現代仙鄉的差別——搭往理想空間的交通工具與裝備。傳統多是以步行、搭船出發，根據《史記》記載，徐福從海上航行：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之。³¹

「入海求之」、「船風引而去」，皆可見徐福透過海路尋找仙人島。《癡人說夢記》受限於徐福的典故，賈守拙的夢境依然延續海上航行，不過在此基礎上後設出「船上蓋九九八十一間高樓，樓房又寬又大」，船隻的規模變得宏大。

當敘事從父親的夢境發展到兒子賈希仙正式尋找仙人島時，裝備更是現代化，眾人搭著備有羅盤針的電氣運動的輪船，帶著在日本精鍊的十桶無煙火藥，十樽氯氣礮與大量槍礮。在精密的科學設備下，「希仙領著眾人，在船頂上觀看風雨表，察得水銀的度數，應該三日後方能息風，還有一場大雨。諸人談些科學，又試演著槍礮一番。」

放在晚清小說中，《癡人說夢記》「遊覽五大洲」此一打開時代新視野的航行方法還算雕蟲小技，月球、星球之旅才叫人嘆為觀止。前往理想空間的交通工具強調科技設備，令人眼花撩亂，海陸空多管齊下，科技日新月異，掀起了航行的新想像。〈烏托邦遊記〉的和尚從何有鄉搭乘「飛空艇」，每晝夜可行五萬幾千里，望遠鏡可望到十幾萬里以外，空中電遞器可在書出版二小時內送來輪船內。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對於飛翔有無限的想像，龍孟華搭著汽球穿越五大洲，尋找當初逃往南洋時失散的妻子。

從人物的裝備的角度，我們可看到新地理學的介入改寫了仙鄉傳說的敘事。在小說中，賈希仙等六人搭布哇的輪船，欲轉往美洲，可是因機器故障偶

30 Lewis Mumford, *The Story of Utopia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6), 1.

31 司馬遷，《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本紀（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頁542、123。

入仙人島，發現此島礦產豐富，物質無缺，於是造船到海外招兵買馬。在傳統的仙鄉傳說中，一旦步出仙鄉，便難於回歸，重而衍生出「尋找、經歷、迷失」的敘事。當賈希仙率領眾徒重訪仙人島時，看似模擬傳統仙鄉的敘事路線，即將步上文學母題的後塵：「爲何找不著那箇仙人島，莫非真箇似古來方士的話，說什麼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麼？」不過，作者無意於論證有／無機心的傳統議題，能否回歸仙人島的關鍵在於科技與知識，眾人最終靠著新地理學的精密儀器、地圖與判斷力，仙鄉不可重返的敘事受到逆轉。隨行人員鄭開智取出用「行軍測繪的法子，繪了一張草圖」的地圖，發現仙人島就在布哇國旁，於是轉回航程，尋得仙人島。新地理觀的介入，改變了「迷失」的敘事範式，也衝擊到淵遠流長的文學母題與文化心理。

綜觀本節，透過「父子」的架構所對照出的空間視野，由仙人島轉向鎮仙城，顯示傳統仙鄉轉到現代烏托邦的軌跡。我們可從多層的「父子」關係探究此空間轉變的意涵：倫理的表徵（賈父與賈子）、政治的象徵（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文化的對照（傳統與現代）等。在現實中受難的賈父，將理想投射到夢中傳統的仙人島，可是畢竟南柯一夢，醒來依舊面臨內憂外患的生存困頓，反映了父親／傳統／老大帝國的窘況。最後藉由兒子賈希仙尋訪仙人島，改寫了傳統的空間視野，解脫困境，建立起兒子／現代／少年中國的新秩序。從小說的脈絡而言，父子的地位出現了轉變，小說結尾處賈希仙將父輩人物接送到仙人島，灌輸憲法、科技等現代觀念，敢怒不敢言的父輩成爲失語的一代，也宣告了「老大帝國」的崩盤。

除此以外，賈希仙的空間視野改寫了仙鄉的「東西」內涵。賈希仙在仙人島上積極開發，以西方民主機制、科技發明拓展出「烏托邦」視野。在東西方的協商、融合、取捨、角逐中，晚清的理想空間出現一系列現代概念，如國家、進化、愛國等。此特殊的東西方的交涉，改寫傳統仙鄉的東西方意涵。原本傳統仙鄉有東西兩大源頭：一是由仙人、方士、蓬萊（海上仙山）、歸墟所組成的「東方」仙鄉；一是由神、巫、崑崙（帝下之都）、黃河之源所組成的「西方」仙鄉。³²到了晚清，「東」、「西」不再是屬於封閉性的中國內部的比較，卻是在新宇宙版圖下的比較。因此，《癡人說夢記》所折射的「仙鄉」方位，已從傳統內地的東（歸墟）西（黃河之源）變成世界地理的東（中國）西（西方）方，此空間新視野反證了晚清「地理大發現」下的新地理觀。本文將在下一節處理此新地理觀如何衝擊到小說的敘事。

32 中國古代的東西方仙鄉系統，乃是參考王孝廉，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同注26，頁49-67。

四、新地理觀：天下為家／天下無家

從「空間」而言，晚清小說經常出現隱喻中國的「破屋」、「破船」、「荒原」等意象。³³這一系列空間隱喻銘記了國恥與國恨，諸如內憂外患、官逼民反、是非顛倒等，反映出時代的危機。小說中的主人翁被迫離開破屋或荒原，遠走他鄉，尋找另一理想空間。當然，這類寫法呼應了《詩經·國風·碩鼠》「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之慨嘆，在文學傳統中顯得老生常談。本節恰好欲將此書寫的範式置入晚清的語境，討論晚清的新地理觀如何形塑出特殊的視域。尤其是「五大洲說」的傳入，使得作家對於世界地理更有涉獵，小說人物的逃亡版圖涉及到了此後起的地理方位。

在「出走」的情節上，旅生以不少篇幅交代幾位有志之士離開中國的原因。仔細觀之，作者凸顯角色受到中西強權的欺凌，正好反映出時人對於「西方」錯綜複雜的心理：賈父因受到中國強權的欺壓，將兒子送到教堂唸書，盼能藉著西方勢力揚眉吐氣。可是兒子希仙「常恨自己為什麼在教堂裏讀書……覺得恥辱已極」，於是與同學甯孫謀、魏淡然逃出教堂。希仙與友人於上海失散，開始了晚清慣有的「孤獨的行旅」的敘述，見證黑暗的中國，從被騙錢、被栽藏鴉片、誤入腐敗學堂，一直到因填〈滿江紅〉遭官府捕押，展開逃亡的生活。留在國內的甯孫謀、魏淡然，立志「把這腐敗世界整頓一番，那時大家有了職業，得償夙願」。在余侍郎的協助下，兩人受皇帝重用，「天天上朝見駕，把胸中的學問經濟，一一展布出來」。正當兩人積極振興商務、開辦路礦、創設學堂、整飭武備時，官員奏他們謀反，兩人逃亡到外洋橫濱。

從賈希仙到甯孫謀、魏淡然，皆以「愛國情操」為形象標籤，卻不遇於時，得到反諷的結論：「我們中國是住不得的了，莫如逃往外國去」。旅生如一般晚清小說作者，傾向於讓角色以個人的姿態面臨整個昏庸的大眾，在書寫上形成「獨異個人」與「庸眾」的對峙畫面，實是魯迅的先聲。晚清諸多小說分享著共同的敘事架構——「獨異個人」見證封閉黑暗的中國，遭到「庸眾」的陷害，接著浪蕩天下。

我們若將晚清「地理大發現」的意義置放於「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的文

33 《癡人說夢記》以「破屋」比喻中國：「簡直是箇老蛀蟲，沒有這樣的蛀蟲，把房子蛀空了，怎倒得下來哩。」此外，頤瑣的《黃繡球》以坍一邊的房子比喻中國，劉鶚的《老殘遊記》以快沈下的船比喻中國，徐念慈的《情天債》以沈睡的荒原比喻中國等。這方面的討論可見筆者的一篇論文《時空建構與國民性——論魯迅〈吶喊〉、《彷徨〉之國民性建構》（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頁295。

學傳統上，可發現「獨異個人」的逃亡路線已經隱含時代的視野。這些小說敘事大量出現從「中國」逃往「國外」的路線，強調「國界」，人物甚至走遍五洲，域內域外已被「國家」界線劃分。前述的五大洲的發現正好為此敘事作了準備，反映晚清的空間觀念的轉變：從封閉的自我凝視轉而到「天下為家」的漫遊。

若是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中心論」在明末清初依然顯得穩固，雖然西方傳教士已經帶入新地圖，可是乾隆年間代表官方觀點的《清朝文獻通考》仍寫著：「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³⁴利馬竇便曾描述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大明帝國的十五個省畫在中央，在四周繪製的海洋中，置上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小島名字，小島的總額面積尚不如中國最小的省。³⁵如此記載與繪製地理與地圖的方法，無疑反映了朝廷封閉的自我凝視。

經過了天翻地覆的歷史變動，「中國中心論」的千秋大夢如前述在晚清時期破碎，而以「五大洲說」為基礎的「天下為家」是否成為晚清知識界的共識呢？我舉出兩條資料說明。一是梁啟超在〈三十自述〉裏提及十八歲時（1891）入京會試，在回程時停留上海，購得取材於西方地理學的《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³⁶梁啟超在偶然接觸下才知「五大洲各國」，可見五大洲此一新地理知識仍未大量普及。可是，康有為一八九六年編寫《日本書目志》卷四史地類時提出：「昔者大地未通，號史學者只識本國而已，其四裔記載僅為附庸。今則環球通達，天下為家，談瀛海者，悉當以履門庭數米鹽視之。」³⁷從「本國」進展到「天下為家」，康有為指出新地理觀已成時代的普遍現象，猶如「履門庭數米鹽視之」，與梁啟超的偶然接觸已經不可同談。

以上兩條反映地理觀的資料雖然可能因為作者的書寫策略與語氣而顯示程度上的差異，不過卻大致顯示同一趨勢：知識分子逐漸接觸新地理觀，五大洲與地圓說已成新地理標誌，敲醒了守舊派的「天朝中國」的美夢。新地理觀影響了中國固有的地理學知識，使得晚清知識分子拓展出全新視野，將眼光投向全球，如徐繼畲《瀛環志略》稱英國首都「殿閣巍峨，規模閎鉅，街衢縱橫穿

34 高宗敕，《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一》（臺北：新興，1963），頁7413。

35 利馬竇 金尼閣著，何高濟 王遵仲譯，《利馬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80。

36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精選》（臺北：正中，2003），頁4。

37 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臺北：宏業，1976），第11冊，頁134。

貫，百貨山積」，法國首都巴黎「文彩精麗」。³⁸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體驗與感想，可用黃遵憲的詩一言以蔽之：「足遍五洲多異想」。³⁹

對於地理的新想像／認識，使得小說裏遠離中國的主人翁在匍匐前進時，輾轉漂泊於國際版圖，風塵僕僕，浪蕩天下，拓展出「全球性」的現代經驗與視野。當然此「全球意識」有別於當今的文化視野，卻可作為我們討論晚清「現代性」的其中一個切入點。當我們準備以康有為所稱的「天下為家」的概念區分晚清與傳統的漂泊主題時，卻出現一弔詭現象。這些以天下為家的人物在浪蕩天下後，竟發現無家可靠，在海外備受歧視，禁止上岸。放在書寫的層面上，原本「遠離中國」乃是有意透過美好異域對照腐敗中國，人物抵達西方，刻畫、銘記、書寫國外的樂園情境，便可完成批判中國的書寫動機。可是在書寫的實踐上，作者延宕了此理想空間的蒞臨時機，角色潛逃至日本、歐美時，難於覓得人間樂園。賈希仙從中國流亡到美國、新加坡、日本，面臨連續的羞恥，甚至降格到動物的位置，失去人的基本尊嚴。

從小說的結構而言，《癡人說夢記》第七回到十七回合，幾位有志之士處於「天下為家」的漂泊狀態，從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布哇、美國、英國到蘇格蘭，到處流蕩，佔了全篇小說的三分之一。第七回的標題「解叛犯江中遇盜，破陰謀海外求生」，開啓了賈希仙等人的漂泊旅程。他們從廣東逃到香港，後又「搭了德國輪船，向新加坡進發」，可是意識到西方人待中國人「作踐（賤）的厲害」，日本才是亞洲唯一列強。於是，眾人又「搭了大阪公司的輪船」前往東京，可是慘遭駐外使館設計緝捕，所幸得到日本外務大臣的解救。賈希仙等人展開海上旅程時因海難落水，被駛往舊金山的輪船救起，在美國上岸時遭刁難：「你們中華人詭譎多端，盡有藉著遊學的名目來作工人的。你若上來也不妨，每人先交五百塊金錢再說。」賈希仙承受「黃皮膚的詛咒」，發出感慨之言：「中華人不准上岸，你我皆是華人，雖然改裝，天然的形狀卻脫不掉，他們好不利（厲）害，卻是認出來的。」言談中帶有雙重的批判，一是批判西方人待中國人如草芥，一是批判中國人，無論是「遠離中國」或「天下為家」的方案，都無法逃脫「黃皮膚的詛咒」。

人物在層層的流離中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之地，原是「天下為家」的漂泊卻引發「天下無家」的慨嘆。「天下為家」與「天下無家」一體兩面，突顯人物的流離姿態，實接收了傳統「上窮碧落下黃泉」卻「陳述無門」的敘事兼抒

38 同注7，頁628，560。

39 黃遵憲，《入境廬詩草．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頁82。

情傳統。西方確實可對照出中國的諸多弊端，可是在書寫上，作者不讓西方成為批判中國的據點。從敘事來考量，「天下為家」與「天下無家」正好進一步引導小說步向空間的虛構化，當人物「徬徨於無地」時，作者適時締造出一虛幻的空間，柳暗花明又一村，替人物打造一安身立命的體系。希仙便是在「天下無家」的敘事脈絡下發現仙人島，在轉往美洲的途中，因機器故障，眾人意外登上傳說中的「仙人島」。這塊虛構之地成為人物的救贖之地，人物將希望投射向此地：

這塊土地膏腴，山勢雄壯，看來農業可興，礦業是一定有的。

原來世間還有這一片乾淨土。

我們在仙人島得著的寶珠珍物不少，變賣起來，富堪敵國，還怕作不成什麼大事業麼？

雖然經過延宕，可是作者還是透過空間的虛化，以「烏托邦」的型態提供一可建構基業的空間。賈希仙並不因「天下無家」而頹喪，反而激勵信心，當「中西」都找不到落腳之處，虛幻空間因應而生，打造兵船，直取仙人島，「得了這箇基業，何愁立腳不牢，好好經營起來，可成大事。」

這種「天下為家」與「天下無家」所交盪出來的烏托邦，展現了獨具一格的面貌：否定式的烏托邦。從表層而言，《癡人說夢記》看似融合古今中西，從中提煉精髓。不過，從修辭策略而言，更深入觀察此看似「肯定」中國與西方的某些特質的空間視野，作家的筆鋒更偏向「否定」——否定中國與西方的某些特質。「天下為家」原本是人物為逃離黑暗中國而展開的旅途，可是流蕩於五湖四海後卻發現自己不見容於西方，無家可歸。因此因應而生的烏托邦視野，一方面因為否定中國的體制，挪用了西方的制度與技術，可是一方面又批判西方列強的殖民行為，批判西方。因此，作家筆下的烏托邦一方面要抗拒中國，一方面又要對付西方，烏托邦的建構成為一種否定式的修辭演出，原本「半東半西」、「又西又東」，變成了「非東非西」的空間方案。透過解構的策略建構出一套理想化的社會與政治視野，遂成為本篇小說特有的空間方案，烏托邦唯有透過輾轉的否定才能成立。

這種否定式的烏托邦視野實應更獲得評論界的注意，蓋因此空間方案投射了整個晚清對於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的繁複心態。晚清遭到西方連串的挫敗，反思中國傳統，借鑑西洋，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大力抨擊傳統與中國。可是，在接受西方之時，不同陣線的知識分子也痛斥輕儒學而醉歐化的潮流，如作於一八八八年的〈倫敦竹枝詞〉嘲諷媚洋風氣：「堪笑今人愛出

洋，出洋最易變心腸。未知防海籌邊策，且效高冠短褐裝」。⁴⁰這是一個否定的時代，在朝代分崩離析之際，各派陣營尚未尋得確切方向，否定多於肯定，對於傳統或歐化都不遺餘力攻擊，《癡人說夢記》的否定式烏托邦某個層面反映了此趨向，在中西兩方都找不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體系，唯有虛化的空間才得以找到。本文下一節將分析此一虛化空間的具體內涵。

五、如何現代？「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

賈希仙在「天下為家」與「天下無家」的情節架構中，航入「仙人島」，建構出現代化的鎮仙城。在現代化的圖景上，我們恰好可進一步探索小說家對於此異質空間的締造方式。以史的脈絡來觀察，我以為最可注意的是此空間融入了往後被五四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質素。五四的啟蒙版圖鮮明鏤刻著科學與民主的標誌，如陳獨秀便在《新青年》創刊號上〈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張「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搬出了「德先生」與「賽先生」來說明。⁴¹當然五四的「科學」與「民主」有其特定語境與意義，與晚清相比存有細部差異，這裏不做此方面論述，乃是取其廣義。⁴²

「民主」與「科學」此一振聾發聵的呼聲並非五四首創，晚清早已躍躍欲試。若是我們聚焦於晚清烏托邦的建構方案，可見法律、教育、軍備、武藝、社會制度等改革呼聲，或是化為情節敘事，或是直接以論述方式出現，無不反映民主與科學的訴求。「德先生」與「賽先生」早已頻頻勾肩搭背，進出各個敘事場域，小說遂展現出一股樂觀與高亢的改革期許。張灝在研究晚清社會的烏托邦時便指出：由儒家及西方入世樂觀主義共同哺育的中國轉型時代的烏托邦主義，常環繞科學主義與民主的理想化而展開，⁴³由此可見晚清烏托邦對於科技文明與民主體制的信賴。

民主思潮與科技知識的傳播跟歷史地理學息息相關。道咸年間魏源、徐繼畲等人編譯世界地理著作、同光年間大量的出使遊記、光宣年間各種地理學教

40 王慎之等，《清代海外竹枝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228。

41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卷1號（1915），頁1-6。

42 關於五四語境的民主與科學定義，可見汪暉，〈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運用〉，《學人》1期（1991），頁49-123。金觀濤、劉青峰〈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圖像〉，收入呂芳上、張哲郎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大文學院，1999），頁809-843。

43 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14卷2期（2003），頁41。

科書的傳播，使得西方民主制度、科學知識得到系統介紹與普及。以郭雙林的研究而言，通過地理學著作而傳入中國的西方近代民主知識，包含議會制度、總統制度、司法獨立制度、政黨政治、三權分立原則、憲法思想和國家學說，並且經歷了一個由憧憬美國、瑞士式的民主共和制度到嚮往英國、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度的過程；在科學方面，包含三大點：1. 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成果，如堅船利炮、鐵路、郵電等。2. 各部門學科知識，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等。3. 保護和促進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制度、政策和設施，如專利制度等。⁴⁴

《癡人說夢記》確實反映了此時代趨勢，旅生透過「德先生」與「賽先生」將「仙人島」一變而為具有烏托邦視野的「鎮仙城」，此新的空間方案經歷現代化的洗禮。作者為編制出具有喚醒／改造／啓蒙意義的敘事，刻意凸顯改造前的仙人島與改造後的鎮仙城的差別。改造前的仙人島可稱是傳統仙鄉的延續，盡量反璞歸真，遠離塵世，自給自足，「不與外交通」，「買物不用錢幣，物物交換」。旅生無意於追尋傳統仙鄉的靜態觀，因此賈希仙等人闖入此擬仙鄉的島嶼時，不同於傳統闖入仙鄉的樵夫、漁夫等，後者經常被化外之境震撼，進而被收編。作者的敘述逸出仙鄉的範式，從讚嘆仙人島轉向批判，仙人島的領導者「教主」成為亂源。作者渲染教主與土民的迷信與愚昧，生病時祈禱神明，拒絕土地開發，「有說勞民傷財不可開的，有人說風水攸關不可開的」。當然此寫法乃是為製造賈希仙一行人入侵島嶼的合理性，如同仲亮的建言：「這島中上下昏愚，迷信神道。古人說得好，道是：『兼弱攻昧』，這昧弱的島國正好攻取，虬髯王扶余正是此意。」

在「兼弱攻昧」的理由下，賈希仙等人侵襲此島，取得一片土地，以現代化取代原先的本土，將原先靜態的「仙人島」改造成動態的「鎮仙城」。從空間命名而言，此「鎮仙城」預設強烈的挑戰姿態，試圖以現代文明「壓鎮」傳統的迷信愚昧。「島」轉向「城」也宣告了整個生活方式、人口分佈、生產秩序、信仰價值的轉變。從空間而言，改革前與改革後的空間視野必然導向強烈的對比，進而拓展出新的空間方案。從情節敘述而言，「鎮仙城」也必然逸出傳統仙人島的範式，從與世隔絕的靜態生活走向了具有全球意識的動態生活。

在情節布置上，「鎮仙城」的現代化並非由賈希仙等人的眼光呈現，而是由異己者的眼光折射，以迂迴的方式增加此空間的改革印象。敘事者巧妙安排仙人島的僧侶達賴領導九位僧徒，到鎮仙城勸說賈希仙等人回頭是岸，效忠教主。他們以異教徒的眼光捕捉鎮仙城的景物：

44 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2000），頁184-185。

只走了三五十步，便有箇警巡兵站著。那街道又闊又乾淨，那蓋的房子都臨著街，沒有圍牆擋著，只幾棵樹圍繞。希仙住宅邊，也不過合（和）民房一般。只見一座總門，匾額上是「再造學堂」四箇金字，走入總門，便是一片草場，足有十來畝寬闊。草場前面，便是三所大房子，一排排的講舍臥室，三所房子都有總門，門上掛著牌子，什麼蒙學、小學、中學三處。踱出花廳閒耍，只見滿園花草，有紅有白，有綠有紫，一股幽香撲入鼻中。說也奇怪，那些島民從前是面黃肌瘦的，如今一箇箇體幹強壯，面皮轉紅。

異教徒的眼光投射出一個洗脫宗教、迷信、神秘色彩的空間，由文明、教育、衛生、健康等概念取而代之。警察荷槍守城，外來者需登記，四處可見巡警。賈希仙與民為鄰，沒有圍牆隔閡。鎮仙城展現完整的教育設備，從蒙學到中學，取代中國的私塾。

敘事者顯然在「教徒的凝視」中預設了「迷信」與「文明」的二元對比，處處將僧人愚昧化。僧侶原先的道德勸說，反被眼前具有高度秩序與現代化的景物震撼，覺今是而昨非，融入由賈希仙領導的新仙人島的秩序。教徒／土人的入城記，成為文化、政治的震撼之旅，改變原有的教徒身分，成為鎮仙城的「現代人」。在異教徒的眼光中，正好可見原是「山峰環抱，中間一片空地，絕好一箇去處」的島南，在賈希仙的開發中，變成「房屋街市，一切齊備」。接著又有各種改革方案，漁戶開墾，五穀生成，錢幣通行，學堂開設，在在展現出一個現代化的城鎮。

「鎮仙城」的現代化乃是由賽先生與德先生支撐，無論在政治體制與科技文明均有建樹。就德先生而言，晚清的思想、文學、政治界似乎都分享著「民主」的框架。從時代語境來評估，西方政治哲學的傳入如傅蘭雅（John Fryer）《佐治芻言》、盧梭（Theodore Rousseau）《民約論》等書提供了書寫的借鑑。⁴⁵賈希仙為脫胎換骨的鎮仙城規劃一套由西方傳入的政治體系，劃分權力，主張立憲，宣揚平等，出現洋洋灑灑的政治論述：

這島裏不分什麼主合（和）民的，總歸公共辦事，主也不能一人獨

45 《佐治芻言》宣揚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民約論》認為人生而平等乃是天賦權利，在晚清產生重大影響。章太炎聲稱讀完《佐治芻言》，「魂精泄橫，熱然似非人」，見章太炎，《章太炎政論選集·變法箴言》（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7。此外，梁啟超編寫《盧梭學案》。鄒容在《革命軍》呼籲：「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見鄒容，《鄒容文選·革命軍》（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頁61。

主，須要大眾商議。住在島中的人，大家不靠勢力，只講公理，公理不合，隨你島主也不能壓制人的。

島主原不是講究有趣的，原是代眾人辦事的，其名叫做公僕。只為這島並非一人的島，是島中人民大家有分的。島既是大家有分的島，便大家作得來主。如今島民的見識也漸開明了，竟不容一人恣睢欺壓他們，只是眾人亂作起主來，橫出主意，也辦不成事，所以設了一箇公處，名為議院，大家公議了，由我們定其從違。又恐怕島民的學問，沒有學好，甚至害了人家的自由，所人（以）立出憲法，要大家遵守，如今大家正議此事哩。

憲法就是公守的法律，只因君主沒有壓制百姓的道理，所以立這箇憲法出來，大家共守。有立法、行法、司法的三大權，立法是議定法律，行法是奉行法律，司法是執定這法律。那其間各有權限，不相侵凌的。

以上賈希仙的政治論述主要強調民主概念，如島主代眾人辦事，乃是公僕，不能一人獨立，須經由大眾商議。這種對於島主權力的限制，目的是為防止霸權政治，凸顯民主概念。此外，島上設有嚴謹的民主機制，出現議院，強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分立，維持公正原則，完成一立憲政體。從對領導者的規範到議院的設立，在在呼應著晚清地理學所帶入的民主思潮。

由於愈來愈多教民投靠鎮仙城，賈希仙的勢力迅速擴大，最終以強大的科技武器奪取仙人島，進行全盤性的造城工程。神宮遭毀掉，改做上下議院，宣告了仙人島的僧侶制邁向民主制。賈希仙當上島主，新設農部大臣、警察部、郵政、學部，使得「全島的人，沒一箇不進學堂，沒一箇不愛國，真是人人有自由的權利。況且農工各藝，次第開創。」賈希仙的政治論述再次顯示晚清對於西方民主的接受語境：三權劃分、島民平等、自由權利等新政治概念。

除《癡人說夢記》以外，晚清尚有諸多烏托邦小說將視角投向德先生，如春風《未來世界》從學校、家庭的改革出發，發揚立憲主張，締造出一民主國家。陳天華〈獅子吼〉主人翁文明種積極推崇宣揚盧梭的《契約論》，將民主體制投射到民權村。懷仁《盧梭魂》在官逼民反的情節敘述中，幾位有識之士奔往獨立峽、自由峰，建立起自由獨立的漢族國家。

當德先生進出烏托邦時，賽先生也不落人後。晚清強調科學思潮，屬於文藝範疇的人文雜誌大量加入科技書寫，如一九〇二年梁啟超論及雜誌《新小說》的小說類型時，其中區分出「哲理科學小說」類，定義為「專借小

說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⁴⁶由此可見新小說與格致學、自然科學發生關係，發展出「緯以人情、經以科技」的書寫範疇。

在科學救國的思潮下，這類書寫因時代的迫切需要被發揚光大，如旅生《癡人說夢記》將晚清對於西方科學的期許，投射到小說中的藏書樓，藏書樓成為人物的知識系譜的轉捩點。賈希仙發現神宮內的藏書樓藏有哥白尼、奈端（Isaac Newton）、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著作，匯聚了西方的技術文明。從學術分類而言，有重學、力學、汽學、醫學、電學、礦學、化學、天文學等書。眾人廢寢忘食，分進合擊。作者挑選了西方的知識系統，讓人物得到啟蒙，也反映出晚清在救亡圖存之時對於西方科技的求索。接著，小說以樂觀的筆調，鋪寫這些有志之士克服困難，學以致用，在仙人島上建立起現代化的「鎮仙城」。

知識系譜的轉變使得仙鄉書寫產生變調，其訴求已不再是傳統的長生不老、小國寡民、無為自然等，卻是為而又為，發展各項現代化的技術。賈希仙引領僧侶看田畝時，呈現現代化的種田技術：「只見彌望青蔥，都是新麥，場上堆著許多機器。希仙一一指點，這是有輪的苗耒，這是耙車，這是割稻車，這是打稻輪機，又說我們這種田，是用化學家裏必格的法子，考察地的原質，配上糞料，所以收成的五穀，分外比人家多，一畝地能養十來口人」。此種田技術已經不同以往，先進的機器可以「一耨便把多少土都掘了起來」，提高效率。僧侶們又被引領到礦山與織布局，「只見一車一車的煤鐵，運出來的不少，就近就有什麼生鐵廠、熟鐵廠、煉鋼廠、機器廠等類。」又引他們去看織布局，「只見那軋花的機軋花，紡紗的機紡紗，織布的機織布。」

僧侶跟隨賈希仙四處參觀，嘖嘖稱奇，從田園瀏覽到礦山、鐵廠、織布局，見識了機器的世界，「只因島中人少，不夠用，所以把機器代人工的。」從機器到技術，都是超前與先進的。小說的結局處出現一個由科技支撐而起的未來中國的夢境，「車子開起來，天旋地轉，果然風快」，「那街道一層還不夠走，車上面還有一層路，車馬喧闐，人聲嘈雜，原來是兩層馬路。」在科技的介入下，「仙人島」的原型範式出現大轉變，作者將整個空間嵌入現代性的版圖。

從《癡人說夢記》擴充出去，晚清一系列小說因受科技的衝擊，締造一頁科技奇譚。作者異想天開，炫耀科學，如吳趼人《新石頭記》以科學技術控制天氣、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主人翁試圖以實驗氣球航向月球、東海覺

46 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4號（1902），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62。

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描寫太陽航行、碧荷館主人《新紀元》在中外大戰中引入洋面探險器、水上步行器、海戰知覺器等先進武器等，皆可見科技介入了小說的書寫，如〈新紀元〉在小說一開始便開宗明義：「編小說的意欲除去了過去、現在兩層，專就未來的世界著想，撰一部理想小說；因為未來世界中一定要發達到極點的乃是科學，所以就借著這科學，做了這部小說的材料。」

這些科技想像，除了炫耀想像，其實更是作者試圖透過文學想像尋找國家出口的途徑。王德威從科幻角度論述晚清小說時，指出在表面的無稽之談外，其實深饒歷史文化意義，以反寫實的筆調，投射最現實的家國危機，而且直指一代中國人想像、言說未來世界的方向及局限。⁴⁷《癡人說夢記》的科技方案，確實可見此理想空間反映了家國危機，在理想空間綺麗的圖景上，寄寓了個人對晚清腐敗積弱的控訴，希冀賽先生的引入，尋找未來中國的可能性。

由上可見，德先生與賽先生為小說打造出一個完全迥異於現實的新圖景，《癡人說夢記》的結尾處正好與晚清影響極大的《百年一覺》如出一轍，將美好圖景投射到未來時間。⁴⁸小說以稽老夢回中國為結束，夢見自己坐了一隻安平輪船駛回中國，於上海登陸，外國字的洋房換了中國字，中國巡警兵取代紅頭巡捕，設立專門學堂，造出無數人材。此時，輪船駕駛、鐵路等工程，歸中國管理，還清債款。整個理想空間呈現現代化，中國在科技文明的介入下變得強大與進步，電汽車滿街都是。在政治層面上，皇上沒多餘的護從，不坐轎子，往外察訪政治，「倒像箇隨從一般」，體現了民主的概念。從政治到科技到民生等，未來的中國也變成了鎮仙城的烏托邦圖景。

為進一步凸顯此特殊的時代想像，我以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問世的《鏡花緣》作一比較。晚清小說家吳趸人稱此小說為「理想小說」，而大陸評論者袁進更進一步將此小說與晚清的理想小說作一聯繫：「《鏡花緣》以海外風光的描寫借寓作者的理想，針砭當時的社會，為近代的『理想小說』提供了現成的模式，廣泛影響了晚清那些借小說說明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小說作者。」⁴⁹但是，在此看似繼承的關係圖譜上，我們卻可發現寫於鴉片戰爭前的《鏡花緣》以及

47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1993），頁138。

48 《百年一覺》描述二〇〇〇年美國已消滅私有制，一切按勞力分配，科技高度發達，精神生活充實，震撼晚清人。晚清譚嗣同稱「若西書《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像焉。」見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出版社，1981），頁367。今人陳平原亦稱此書是晚清最早對中國作家產生影響的幾部西方譯作之一。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41。

49 袁進，《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0-11。

清末的《癡人說夢記》，出現絕大的價值斷裂。《鏡花緣》唐敖出身書香世家，以儒生身分參與海外貿易，多少反映了嘉、道時期的資本主義的興起。不過，這一場熔幻想與寫實於一爐的海外之旅，主要仍延續傳統議題的思辨。作者憧憬一理想世界，如唐敖進入的君子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謙恭有禮」，從下層隸卒到朝廷王公貴族，顯現一幅好讓不爭的行樂圖。當然也有論者稱此行樂圖帶有反諷意涵，「好讓不爭」潛伏著「因讓而爭」的因子，「作者用反常的悖謬方法將常態下的交易作法和道德訴求加以顛倒反轉。」⁵⁰無論是歌頌或是反諷，其預設的議題仍不脫傳統的倫理思維，諸如忠恕之道、好讓不爭、人情風俗等，並沒有反映知識結構的轉變。書中人物到海外旅行時，有意無意以天朝為榮，流露出傳統「天下共主」、「中央之國」的空間思維，沿途所經的諸國都要謙卑感激天朝的感化。

相形之下，《癡人說夢記》人物的漂流是一場政治、文化、身分的苦旅。雖然與《鏡花緣》時代隔得不遠，但是經由鴉片戰爭後的時局遽變，知識分子早已開眼看世界，發現新地理，以及接受由地理知識傳播進來的民主與科技知識，因此文本中呈現的理想圖已經改弦易轍——五大洲的國際版圖取代了君子國，小人國等寓言式的地標，天下無家改寫了天朝大國，民主科學的價值思維逸出了忠恕之道的思辨。這些轉變也說明了晚清新地理觀如何衝擊到小說的敘事。

六、（反）解放的圖景：烏托邦？反烏托邦？

以上德先生與賽先生替晚清的空間版圖勾勒出一幅美好之景，旅生透過文學想像與政治抱負，構築出宏偉藍圖。其筆下的角色全神貫注於實踐此一至善臻美的終極目標，如宣揚民主、發展科學、啓民救國等，敘事的圖像實已涉及廣泛的社會生活。小說中的烏托邦乃是架構在現實的窠臼與對未來的前景上，如金觀濤所言：「烏托邦主義的勃興，必須有兩個社會條件，一個是西方學者常說的現實社會的苦難，另一個是民族文化中原有的社會怎樣才算完美的價值。」⁵¹從《癡人說夢記》的小說結構而言，前半部寫出末世的紛亂雜陳與社會苦難，後半部則是思索與建構一完美價值的社會，以尋得解脫。由此也可見，這種烏托邦的書寫置於救國的語境展開，存在於幻想的烏托邦之景，實欲解放

50 郭玉林，《鏡花緣》中「君子國」的道德問題，《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5卷(2003)，頁802。

51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1990年2期，頁18。

現實生活的痼疾，為千瘡百孔的老中國尋找出路。

在時代的困境下，蕭然鬱生〈烏托邦遊記〉、碧荷館主人《新紀元》、吳趸人《新石頭記》、徐念慈〈情天債〉、陸士諤〈新中國〉、陳天華〈獅子吼〉、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蔡元培〈新年夢〉、顧瑛《黃繡球》等都透過異質的時空觀呼喚新中國的到來。作者以未來時間、夢中奇景、闖入異域此三種最常見的敘事模式，發出解脫窠臼束縛的願望以及勾勒新中國的社會藍圖。

無論是夢中、未來、異域的締結手法，都一脈相通：在這些異質時空的框架上，作者企圖為時代把脈，尋找解藥，引入科技，實行民主，試圖以此喚醒「睡獅」，建構未來新中國。《癡人說夢記》在這些作品中更是有其價值，如歐陽建所言：「站在二十世紀起點的中國人，所夢想的重大題目，就是實現民主政治、發展民族經濟，以振興中華，而《癡人說夢記》，正是第一部以正面理想人物為中心的具有完整結構的長篇小說，它在晚清小說史上的地位，是應該給予重視的。」⁵²

在此看似穩定的「束縛—解放」的敘事結構中，從表層而言，呈現出一幅燦爛的美好圖景，架構出所謂的烏托邦圖像。可是，我們卻可進一步思考：當晚清小說作者群以鮮明且強勢的姿態將小說文體轉變為救國工具，帶著犀利的批判意識與期待心理，將時代與個人的意識型態、政治選擇、文化想像、憂患意識填補入這些將然未然的異質時空時，烏托邦方案是否能夠負荷這麼沈重的時代負擔？一再於敘事中呈現的「良辰美景」是否能夠承擔作家群強烈的書寫動機？強調解放的烏托邦方案是否同時也潛伏著異質的雜音，而形成一種曖昧的空間意涵？以下將從烏托邦方案、《癡人說夢記》以及其他相關小說思考。

在晚清訴求烏托邦的潮流中，仍須更深一層去檢驗其內在可能含有的危險性。卡爾·巴柏(Karl Popper)描述最危險的「烏托邦工程」(utopian engineering)時稱：看似賞心悅目的(烏托邦)思想進路卻內含極權主義性，蓋因在朝著烏托邦前進時，任何對此目標之可欲性的懷疑，都將使整個烏托邦工程岌岌可危。因此，所有個體的選擇都必須加以約束。此約束的方式或溫和或殘暴，如教育、宣傳、灌輸、壓制、批判、恐嚇直至從肉體上消滅異議分子。這當中，最一勞永逸的手段便是建立一套「極權主義」的制度。⁵³卡爾·巴柏犀利的反思，提醒了我們烏托邦隱含的危險性，烏托邦無法允許任何異議，極易走向極權。若是我們將此反思置入晚清小說的烏托邦方案，正好可重新評估此一空間想像的

52 同注2，頁240。

53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74-105.

複雜意涵。

《癡人說夢記》前半部處理舊中國時，批判政府的霸權思維與高壓手段，使得賈希仙等有為青年流蕩天涯。在流蕩的過程中，主人翁不忘為弱勢喉舌，如漁民因苛稅猛於虎，隨同賈希仙航向仙人島。眾人途經「滅黑國」時，眼見白人以先進武器滅領導者活佛，透過搬遷的方式耗盡居民體力，以達成滅種之目的。賈希仙批判白人殘暴的殖民行為，發揮晚清大肆流行的「物競天擇」的概念：「只怕不但愚人競不過智人，以致滅種，便智人裏面也要相競起來，也有箇優勝劣敗。」

從中國到海外，猶如一場「黑暗之心」的漫遊，讓賈希仙體驗良多。以書寫策略而言，此黑暗面乃可透過「對照」的方式，襯托出而後的烏托邦的光明性。在敘事者正邪二分的敘事立場下，賈希仙果然以君臨天下的姿態進駐仙人島，在加冕的光環中，其改造島嶼的手段獲得肯定，諸多極權的行為在正義旗幟的掩蓋下，輕易合理化。一群人浩浩蕩蕩，帶著「十桶無煙火藥，又練就氣礮」，開往仙人島，當他們登上某島避風時，「忽見一箇山洞，走入看時，裏面漆黑，再走幾步」，見到島民「赤裸身體，身上長著一寸長的黑毛，雙睛帶碧，著實兇惡」。透過命名的方式，此行人將文明／野蠻、落後／先進的概念強加於土人，取得消滅對方的合理性。當東方仲亮等人與毛人大戰時，如此命名毛人：「這樣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東西，如此愚蠢，偏要害人，始終害了自己。」作為領土入侵者，他們卻挾著科技武器取得絕對優勢，以文化霸權將對方劃分為野蠻人。

旅生在賈希仙與土人的關係中，確立了「我們與他者」的形象，凸顯了異域的土人與賈希仙等人的二元對立。如果土人是停滯落後的，那麼賈希仙等人便是民主自由的化身。在文本中，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等概念的差異意味著等級，而文明高於野蠻、民主高於專制。當文明征服野蠻時，是屬於正義的行為，體現了歷史不可阻擋的進步意志，當中的罪惡與殘酷輕易被文明、光明、希望、博愛等修辭遮蔽。所有關於土人的形象進入賈希仙等人的視野，都按照「文明與野蠻」的框架修剪，或誇大或簡化，或遮蔽或發明，被本質化成一種固定且具有階級排序的異域形象。賈希仙等人可能具有的負面行為被刪除、遮蔽、忽視，其披蓋著現代化大衣的道德政治則是被放大與頌揚。

很反諷的是，此由一系列權力話語構成的「他者化」的功能架構，卻是當初促成賈希仙等人流亡的肇因。賈希仙看待土人的眼光，重蹈了西方對中國以及中國傳統對於晚清新知識分子的霸權凝視。賈希仙模仿了此霸權眼光，不自覺陷入「他者」的權力劃分中。仙人島教主原不許他們停留，賈希仙踵白人後塵，以手槍發彈，射穿柱子，驚嚇教主，取得島南的空地。當此空地無法負荷

起進一步的發展時，賈希仙等人試圖擴大殖民地，最後以解救僧徒為名，佔據整個仙人島，以正義之名軟禁島主：「島東一帶都是寺宇，如今把教主合（和）眾僧官送到那裏去住，每月給他糧食，養老終身，只不許出來管事。所有島中房屋田地，待我查勘過了，給你們耕種居住。」從敘事技巧而言，作者先述及白人在「滅法國」的滅種行徑，再述及賈希仙給予教主養老環境，替島民謀求生路，此強烈對比的殖民待遇乃是有意合理化賈希仙的行為。

在此空間方案中，旅生刻意營造一個可以襯托民主假象的敘事框架，不過看似寬容的替代方案卻有著內部的自我消解性，使得原本角色欲達到的理想空間衍生出作者意料之外的殘暴面，促成創作動機與書寫結果的斷裂。烏托邦產生變化，秩序變成組織，滿足變成條件的反射，教育變成灌輸，選擇的自由變成犧牲的自由，正好符合烏托邦的「異化」理論：賈希仙的目標是平等主義，手段卻是菁英主義；其目標是替全島民謀取幸福，手段卻是剝削犧牲；其目標是和平，手段卻是專制；目標是和平，手段是暴力；目標是和諧，手段是鬥爭；目標是弱化政府，手段是強化政權。⁵⁴賈希仙創造的空間方案中，一系列手段異化為目的，宣告了「烏托邦」不再是穩定的價值體系，其原本預設的核心價值在「手段異化成目的」的軸線上受到衝擊。

由於烏托邦以超越現實的理想為目標，欲提升人的素質，因此預設了一前提：認為人在道德與智力方面存有等級性差異。在此前提下，烏托邦必設定一個無所不能的神，進行教誨的工作。原先被西方人視為懦夫、被朝廷視為叛徒的賈希仙，在島上一變而為「神」，以教誨島民為己職：

我並不是要收你們教中的百姓，只是可憐你們百姓，生在這荒島，一些學問沒有，徒然信了神佛的荒唐話，懵懂一世，而且衛生的飲食器具，一無所有，人生如此，不太苦了麼？我因發了這箇宏願，要替你們教養百姓，毫無歹意，休得疑心！

賈希仙透過一套宏偉的說詞，自我神化，取得殖民他人的權位。這種宏偉的敘述建構在一套話語操控權上，區分出智愚，再以「智統治愚」的見解放到政治版圖，使得賈希仙可以大張旗鼓地統治與教化眾民，甚至在「德先生」的招牌下，摧毀島上原先的宗教信仰。

這個由菁英統治的烏托邦圖景，浮現諸多雜質，無法允許異己。異己者沒有機會逸出威權體系，紛紛面臨被驅逐、教化、同化、收編的命運。高壓的措施乃是為確保所有教民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模範公民，「現代化」遂成為殖民

54 此烏托邦的「異化」的理論參考自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當代》61期（1991），頁62。

的手段。因此，在賈希仙開拓現代性時，卻又回歸到他原先批判的威權。這當中，又因為過度仰賴與信任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價值，掩蓋了其他可能的方案，導致其烏托邦視野缺乏多元性的框架。烏托邦作家威爾斯（H.G Wells）曾如此批評烏托邦的架構：「在關於烏托邦的思考中，總是有著僵固和薄弱的結果。其共同的缺點是空洞。生活中的血性、溫暖與事實，大部分都是缺乏的；在這種思考中，沒有有個性的個人，而只有一般化了的人民。」⁵⁵在《癡人說夢記》中，此「一般化的人民」，都是在為時代尋找出口的政治層面的模範公民，分享著類同的秩序結構。

此外，在前述「否定式的烏托邦」圖景中，由於為了擺脫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的強權，旅生無可避免地將自己擺上戰鬥的位置，其筆下人物以西方與中國作為競爭與批判的對象。可是，當他們要擺脫西方與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卻同時陷入了兩者的窠臼。如在批判中國封建體制時，卻流露出自我對於權力的幻想：「希仙大哥如今是做了仙人島的島主，老伯此去，是要做太上皇的，並不止做什麼官……那仙人島在海外，不歸中國管轄的。」賈希仙等人原欲批判西方的殖民主義，可是卻以相同的「船堅砲利」征服仙人島，並且構思如何進一步殖民世界。

事實上，晚清有諸多小說批判老大帝國時，卻在另外一個向度呼喚與呼應老大帝國，亦步亦趨地回歸其批判的老大帝國的體系。陸士諤〈新中國〉透過人物的夢中奇景塑造出未來新中國，全世界二十多國會議設立弭兵會，合併萬國裁判衙門，由中國皇帝出任會長，收編德、美、意、日、俄等列強。東海覺我（徐念慈）〈情天債〉想像一九六四年的中國「獨立在亞洲大陸上，與世界各國平等往來，居然執著亞洲各國的牛耳。」《未來世界》嚮往「三百年老大帝國，忽成獨立之邦；四百兆黃種同胞，共進文明之域」的大中國，總教習陳國柱顯示老大帝國的心態教訓俄國人。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為中國的現代文明制訂時間表，一九六二年中國已躋身為列強之首，各國政要聚集南京，成立由中國倡導的萬國太平會議，「中國穩穩地做了全世界的主人翁」。《新紀元》寫一九九九年的中國已經是國富兵強，發展出各種先進武器，敵軍屢敗，設定十二條款，與中國議和。

這些小說幻想強權，一再不自覺地流露出主宰世界的欲望。作家書寫烏托邦的動機，原是為消除霸權，實踐民主方案，解決國家危機。可是其書寫結果，卻反映了對於權力體系的念茲在茲，很反諷地重蹈了老大帝國的姿態。中國學者鄭家建對此提出一深入的觀點：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極力創建、想像一個新

55 H.G. Wells, *A Modern Utopia* (Linc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67), 9.

空間，以應付眼前的危機。「提前」想像一套改革後的中國前景，因此動盪的、不穩定的、危機的空間消失，中國人的心靈在這種前景（空間）的想像中獲得樂觀的安居，「改革後的中國必將稱霸世界，重新回到那個永恆的世界中心」，「一幅天朝老大的神氣又躍然紙上，傳統的空間知覺方式又一次占上了風」，「越是在那種慷慨激昂、信心十足的言辭背後，我們就越能把握到一種混亂迷茫的圖景。你看，他們爲了突出中國的中心地位，不惜毫無方位感地對諸多國家進行隨心所欲的拼合。」⁵⁶

鄭家建的論述恰好可作爲我們評論烏托邦小說的借鑑。晚清政局的發展以及新地理觀的傳播，使得小說作者從文化獨尊的狀態甦醒，經歷痛苦的失落，又重新在新世界範圍內恢復和建立自信，其實也反映了烏托邦的特質。現實的匱缺透過烏托邦的想像來填補，而烏托邦的圖景反過來論證了現實的缺憾。在不自覺的意識下，烏托邦的建構顯示曖昧的意涵，其烏托邦一體兩面地反映了反烏托邦的特質。這已不是《癡人說夢記》個別小說的表現，而是集體的時代反應，讓我們看到了晚清小說作者沈重的感時憂國的情結，使得他們創造的烏托邦方案嚴重超載，當手段異化成目的、文體變成工具，我們確實可以質問：到底是烏托邦或反烏托邦？

七、結語：「誤讀」的空間

晚清是一個處於轉折的年代，空間觀念出現劇烈的轉變。現實中的「朝代」在經歷一次次失敗後逐漸分崩離析，再也無法支撐起古老中國的赫赫身影。可是在書寫的領域，「中國」不無修飾的可能，作家透過炫麗離奇的幻想，將眼光投射至未來或是他方，逆向敘事，中國經歷連串改革，大放光芒，執世界之牛耳。因此在「揭發伏藏」、「公認的罪惡」的批判浪潮中，晚清小說卻也大量出現樂觀的筆調，以未來的繁華爲藍圖，將希望投射到虛幻的異域，構築出一具有烏托邦視野的空間方案。

當然，在古今中外的文學長河中，締造理想空間的書寫屢出不窮，「理想」與「現實」的抗衡乃是普遍性的視角。可是，晚清作者卻爲我們展示迷人的空間書寫，聚合諸多張力，呈現獨特視域。在新地理學的知識體系下，作家在呼喚著仙鄉傳統時，卻不斷歧出仙鄉範疇，仙鄉意義被改寫、摻雜。小說透過賈氏父子兩代的空間想像，勾勒出傳統仙鄉的召喚／歧出關係，從「仙人島」轉向「鎮仙城」，隱喻了舊中國與新中國的嬗變關係。此仙城已非彼仙鄉，融入

⁵⁶ 鄭家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上海：三聯，2002），頁17-20。

時代的想像、期許、焦慮，構築出屬於晚清特有的現代化的空間。

透過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介入，旅生改寫傳統仙鄉，鎮仙城由文明、教育、民主、科技組成，展現出與傳統仙鄉迥然不同的面貌。在政治體制方面，出現司法、立法、行法三權分立，呼喚著民主體制的到來。在科技方面，出現重學、力學、汽學、醫學、電學、礦學等各種學問，發揮到日常生活時，變成各種先進機器。此由民主與科技構成的空間視野乃是對準晚清的積弱與匱缺而發，具有啟蒙意義。由此也可見，從鎮仙城到烏托邦，中國人的追求始終被民主制度與科技信念所鼓舞。

不過，此烏托邦卻一體兩面，呈現出反烏托邦的景致。賈希仙逆轉原先的強弱位置，不自覺複製了先前受到欺壓的手段，將德先生與賽先生當成價值衡量的準則，再透過命名的方式達到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人物的「出入」烏托邦愈顯曖昧，在進入神仙島，想像烏托邦時，卻陷入了身不由己的重擔，驅逐了烏托邦原有的意涵，「入邦」很反諷地成為一種「出邦」的演出。

我們可以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誤讀」理論作為一總結，布魯姆提出文學史的「影響」不是對於前人的承繼，而是對前人的誤讀、修正和改造。他把一部文學影響史歸結為對前輩誤讀、誤解和修正主義的歷史，並非只是前輩對於後輩的傳授、支配、左右以及後學對於前輩的學習、模仿、繼承。他認為誤讀實際上是後輩與前輩的鬥爭與衝突。⁵⁷從「誤讀」觀點來看，與其說是傳統的仙鄉「影響」了晚清的小說家，倒不如說是晚清小說家透過「誤讀」達到了一種政治性的空間創造。因此，《癡人說夢記》在眾多處模擬／呼應／扭曲傳統的「仙鄉」書寫，其實反映了晚清對於傳統空間的鬥爭與抗衡，透過具有文化、政治隱喻的父子關係（賈氏父子）的空間想像，讓我們清楚看到烏托邦視野的「鎮仙城」改寫了傳統旨趣的仙鄉空間。

57 布魯姆主要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切入，他認為一部詩歌史是詩人與偉大前輩之間的鬥爭，如布魯克（Blake）就是在擺脫彌爾頓（Milton）的決定性影響和重寫《失樂園》的鬥爭中，確立起他自己的天才地位。見哈德羅·布魯姆著，朱元立、陳克明譯，《比較文學影響論——誤讀圖示》（板橋：駱駝，1992），頁2-3。

參考書目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
- 小川環樹著，張桐生譯，〈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幼獅月刊》40卷5期，1974。
-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
- 王孝廉，〈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文史學報》第12期，1982。
-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1993。
- 王慎之等，《清代海外竹枝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杞憂子，〈苦學生〉，《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湖南：岳麓書社，1985。
-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1996。
- 李歐梵，〈孤獨的旅行者〉，《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 吳趸人，《新石頭記》，鄭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 汪暉，〈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運用〉，《學人》第1期，1991。
- 呂芳上、張哲郎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大文學院，1999。
- 東海覺我、徐念慈，〈情天債〉，《女子世界》第1期，1904。
- 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1985。
- 春風，《未來世界》，《晚清小說全集》，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87。
- 哈德羅·布魯姆著，朱元立、陳克明譯，《比較文學影響論——誤讀圖示》，板橋：駱駝，1992。
-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旅生，《癡人說夢記》，《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袁進，《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1902。

-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60。
-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章太炎，《章太炎政論選集·變法箴言》，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
- 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
- 陳天華，〈獅子吼〉，《晚清小說全集》，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87。
- 陳平原，〈傳統文體之滲入小說〉，《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臺北：久大文化，1990。
-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第15卷第3期，1986。
- 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第14卷第2期，2003。
- 陸士諤，〈新中國〉，《中國進化小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 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2000。
- 郭玉林，〈《鏡花緣》中「君子國」的道德問題〉，《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2003。
-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
- 曾樸，《孽海花》，《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新世界小說社，〈論科學之發達可以闢舊小說之荒謬思想〉，《新世界小說社報》第2期，1906。
- 鄒容，《鄒容文選·革命軍》，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2000。
- 楊玉成，〈世紀末的省思：〈桃花源記并詩〉的文化和社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卷4期，1998。
-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71。
- 碧荷館主人，〈新紀元〉，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 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臺北市：宏業，1976。
- 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臺北：谷風，1989。
- 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鄭文惠，〈新形式典範的重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新探〉，衣若芬、

- 劉宛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 鄭家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上海：三聯，2002。
- 歐陽建，《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
- 蕭然鬱生，〈烏托邦遊記〉，《月月小說》第1期，1906。
- 頤瑣，《黃繡球》，《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魏源，〈西洋人瑪吉士地理備考敘〉，《海國圖志》，湖南：岳麓，1998。
- 顏健富，《論魯迅《吶喊》、《徬徨》之國民性建構》，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 顏健富，〈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漢學研究》20卷2期，2002。
- 顏健富，〈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23卷1期，2005。
-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懷仁，〈盧梭魂〉，《東歐女豪傑》，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
- 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當代》第61期，1991。
- Eric Voegelin,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Chicago: Gateway Edition, 1968).
- Gorman Beauchamp,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Midwest Quarterly*, 16 (1975).
- H.G. Wells, *A modern Utopia* (Linc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67).
-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 Lewis Mumford, *The Story of Utopia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6).
- Michel Foucault, "Text/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Spring).
- Thomas More, *Utopia*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47).

From Wandering around the Island of Immortals to
Envisioning the Perspective of Utopia:
Spatial Imagination in Lu Sheng's
Chi Ren Shuo Meng Ji

Guan, Kean-fu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era, the concepts of space were confronted with a changing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that in turn affected literary expression. Focusing on *Dream Talk of an Imbecile* (*Chiren shuo mengji*),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esentation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era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Age of Discovery.” First of all, it tracks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n the novel, thus exploring the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island of immortals” (*xianren dao*) towards a modern vision of the “town of suppressed immortals” (*zhen xian cheng*). How did a new geographical vision – concepts such as the five continents and the nation-state – enter the novel’s space and affect its narrative? The characters must discover that *tianxia*, which they had taken granted for their home, does not at all belong to them; searching for a route of escape, they construct a new surreal space: Utopia.

The article goes on to analyze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is surreal space: thus enter science and democracy, precedents of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Yet when the utopian plan is completely laid out, it turns into its own other, to an anti-utopia: disposing its original ideal and causing a rift between the writing motive and its written result.

Keywords: Lu Sheng, Utopia, island of immortals, late Qing, geography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